



信心危機

● 老冠祥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香港人至少經歷了四次的「信心危機」。首先是因香港前途問題而引發的，其次是因「六四事件」，第三次是「沙士事件」；最新的一次是因國際金融危機而誘發的。

筆者的觀察是：當每一次社會出現嚴重危機時，市民的信心都會下滑；不過今次的「信心危機」比以往的更為嚴峻，因為現在香港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挑戰何來？

首先是經濟惡化。經濟退衰，出口放緩；在珠三角經營的港資企業告急。加上各種的投資工具，諸如股票、基金、房地產、退休基金均告失利，財富在過去一年大幅蒸發，香港的百萬富翁人數一年中減少了16%；加上匯控股

票大跌，「雷曼事件」的發生，使很多「退休族」生計出現問題。

二是失業率上升。香港失業率已到了5%，還在上升中。因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將重點強調在「保就業」的問題之上。香港政府宣布撥款十六億元，在未來三年創造約六萬二千個工作及實習機會等。

三是社會問題頻生。澳門「二十三條立法」後，澳門特區政府有選擇性地拒絕讓部分泛民主派成員入境，使人擔心今日澳門將成為明日香港的寫照。立法局對「梁展文事件」展開聆訊，讓人關心高官退休後為財團服務，可能存在「利益輸送」的問題。

四是價值的混亂。一向關心傳媒和社會問題的「明光社」被指為「教會的右派」。香港社會本來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現在卻變得愈來愈容不下正義的聲音。

這些都是香港面臨的諸多挑戰的一部分，如果不妥善處理，特別是當各種危機聚合在一起時，未來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危機。但麻煩的是，香港處於經濟衰退之中，財政儲備減少，令解決問題的工具和手段也在減少。

面對「信心危機」，市民需要有領袖的「安慰」。內地有溫家寶總理在兩會中的「信心」喊話；香港有誰在為這些無助的市民發出信心的聲音呢？香港政府未能做到，最少從最近的施政報告中，看不出財政司提出的解決方案的力度是足夠的。

昔日，當耶穌和門徒乘漁船橫渡加利利海時，在驚濤駭浪中，耶穌在休息，門徒在呼求，最後耶穌起來平定了風浪，讓門徒認識耶穌是主。現在，市民在呼求，弟兄姊妹，你認為誰能安慰憂傷市民的心靈？誰能恢復市民的信心？

（作者為本刊顧問，於長洲堂聚會）



福音籃球好處多

● 陶傳家

教會如果要發展福音籃球事工，可物色多位籃球佈道者，無須精通運動，只要不抗拒運動即可；他們可承擔分享福音信息、參與球賽和關顧等工作。或者，以一個團契／小組為單位，透過群體的動力，彼此鼓勵藉籃球活動領人歸主，總比停留在小圈子獨自享受更好。福音籃球隊平日除了集訓，還可以為他們舉辦一些環繞福音內容的暑期籃球班、營會、聯賽等，再配以關係佈道法，希望未信主的球員，最終能夠認識主耶穌。

最後，福音籃球不可以帮助未信主的朋友，也可以造就教會的領袖。有些信徒未必善於帶查經班或主日學教導，但教會卻可以讓善於在運動中表達自己的信徒，藉著參與定期籃球佈道的事奉過程中被建立，成為新一代的僕人領袖。

（作者曾於體育事工聯盟事奉，現於建造神學院進修）

福音籃球另一個好處，就是知識與感官經驗並重。籃球運動本身已具有福音元素，納史密斯博士在百多年前發明了籃球，將基督教的聖經原則，透過籃球運動表達出來，佈道者可用犯規作比喻，表示人犯罪了，當向主耶穌認罪後，便不再被定罪以及追究舊有的記錄，可重新作賽。佈道者亦可以用球例不允許球員用身體攻擊對方，表達愛人如己。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借籃球宣講福音，亦可讓接觸對象透過籃球活動中的感官經驗來經歷信仰內容。

還有，籃球是跨文化的，是一種世界性語言，超越了年齡、性別、宗教、種族及社會階級的障礙。未信者與信徒之間可藉此產生一定的共鳴感。有利於佈道者透過籃球喻道，從道德倫理和其他人生話題，順暢地結連到信仰話題。

球場做運動減壓。因此，教會的團契或小組，可藉籃球活動延伸至社區層面。

「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特別是針對現今側重個人生活而缺乏群體生活的年代。未信主的人未必會主動走到教會聽道，但卻樂意往球場做運動減壓。因此，教會的團契或小組，可藉籃球活動延伸至社區層面。

聽聞福音，生命得著改變。

籃球活動適合喜歡生活具有動感的人，不論兒童、青少年、職青、男士或女士，長者也適合；此外，特別是男士，或怕悶、不習慣教會靜態分享心事文化的一群，籃球活動對他們來說，是相當有吸引力的。

說來福音籃球好處真多。首先，是群體生活化。籃球佈道，可以從生活入手。「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特別是針對現今側重個人生活而缺乏群體生活的年代。未信主的人未必會主動走到教會聽道，但卻樂意往球場做運動減壓。因此，教會的團契或小組，可藉籃球活動延伸至社區層面。



現代人的心理及精神面貌(上)

● 賴子健

前言

在過去幾百年，人類的物質文明有很大的進步，思想也愈來愈自由開放，男女、種族平等觀念在上世紀已逐漸形成。現代醫學已掌握了很多疾病的成因及治療方法，連發展較後的精神醫學也有不少治療上的突破。同時，心理學使我們對人的思想行為有更深入的了解。

但是，現代人的心理健康不見得更好。縱然沒有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及經濟衰退，香港人患上抑鬱症等情緒病愈來愈多，自殺率在過去十年高企不下，離婚率上升；青少年備受各樣家庭問題困擾，隱蔽青年成為社會現象，濫用「K仔」成為尋找刺激或自我麻醉的途徑。

不但香港如此，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預料到了二〇二〇年抑鬱症會成為繼冠心病以後引致最多殘疾的疾病。很多研究亦發

現，一個社會的物質富裕程度，與人民的快樂或幸福感不成正比。

問題在哪裡？

科技發展，延展了人類智慧潛質的發揮，但也扭曲了正常健康的生活規律。如電力的發明，藉著電燈的普及，我們的工作時間延長了，也減少了睡眠。有研究發現，我們比一個世紀前的先祖，平均每晚睡少了大約一個小時。

電腦和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所有人的工作、溝通，以至生活方式；我們可以高速地傳遞大量文件和信息。但同時，我們容許工作入侵我們的私人時間及家庭生活，令工作和休息之間的界線模糊了。不能放下工作的思慮，我們又如何鬆弛身心，或專心靈修和敬拜呢？

經濟金融的全球化，令我們盲目地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漸漸地身陷有投機成分的財富追

求。消費和借貸成了不少人的理財原則，到經濟崩潰時才發覺早已泥足深陷。

有一段長時間，醫學的發展只著眼身體的研究，心理學和精神醫學偏重了行為、認知及腦部生化失調的治療，某程度上忽略了全人醫治所不能缺少的靈性層面（Spirituality）。直至近年，病人的心靈需要和全人醫治的觀念才被重視。

文明及科技的高速發展，帶來高效率的生產力及物質上的官感滿足，但遺忘了心靈的需要。人類能發明各樣意想不到的技術，但神在哪裡呢？我們還需要神嗎？驕傲令人自覺偉大，自以為能解決人類的問題，忘記了神的主權和掌管。反而，極端的種族及政治理念，引發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和人為的災難。

在以後的兩部分，筆者會繼續用一個精神科工作者的角度，探討反省及可行的調校方法。

（作者為精神科醫生，於本會聚會）

